

新闻研究资料

白头记者话当年

我和华商报

战后港粤进步报刊

新闻标题史料及研究

忆东北新华广播电台

夏衍

张友渔

钟紫等

徐铸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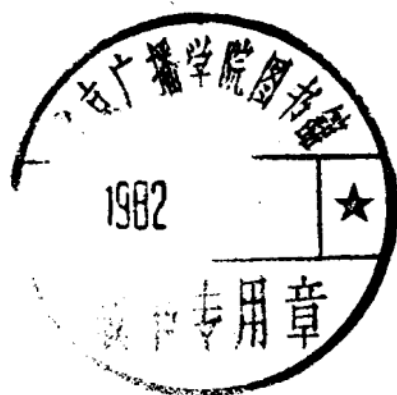
罗清

展望出版社

新闻研究资料丛刊

总第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展望出版社

新华书店
PDC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十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编辑

展望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80,000 字
1982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 1982 年 6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7271·031 定价: 0.80 元

目 录

关于《华商报》

- 白头记者话当年——记香港《华商报》……夏 衍(1)
我和《华商报》……张友渔(18)
杨奇谈复刊后的《华商报》……马文通 整理(27)
《华商报》对“中间路线”的批判……俞 萌(40)

战后港粤进步报刊

- 战后香港第一家党报——《正报》……钟 紫(51)
战斗在港穗的《人民报》……陈伟民(58)
《周末报》的来踪去迹……冯英子(65)

新闻标题史料及研究

- 下笔应有神——谈谈新闻标题……徐铸成(76)
新闻标题论述(辑录)……章霁 辑(81)
新闻标题的演变及制作……李长群(108)
一条闯祸的标题……穆逸群(125)

关于《新闻报》

- 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汪仲韦 (徐耻痕整理)(127)

报刊史料

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四）

.....方汉奇 谷长岭 冯 迈（158）

广播史料

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罗 清（203）

我国广播事业之发轫.....赵玉明（219）

出版史料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半月刊——《绣像小说》.....汪家熔（222）

白色恐怖下的武汉联营书店.....马仲扬（229）

作者·读者.....（256）

白头记者话当年

——记香港《华商报》

夏衍

皖南事变之后，我于 1941 年 2 月初（农历除夕那一天）离开桂林赴香港，搭的是欧亚航空公司的只有二十个坐位的小飞机，傍晚起飞，到香港已经是午夜了。在启德机场降落的时候，是一片“送旧迎新”的爆竹之声。香港依旧是那样的繁华、热闹、嘈杂，但从我这个“内地”出来的人看来，这儿似乎还是一个世外桃源。在尖沙嘴买了份当天的晚报，尽管中日之间、英法德意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而这里的报纸版面上还是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

在国际新闻社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找廖承志同志。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周恩来同志要我到香港，不单是为了“避难”，主要是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今天叫东南亚）和西方各国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他一提，问题就明白了。因为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不仅加强了新闻检查和“邮检”，还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样，香港同胞和广大华侨，就看不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和一切进步刊物了。而重庆的国民党和南京的汪伪集团，配合德意日三国同盟，通过他们各自的新闻传播系统，正在大肆制造“汪蒋合流”、反苏反共的舆论。因此，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对外宣

传据点，让香港同胞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玩弄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就成了我们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廖承志同志还告诉我，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重庆、桂林，将有一大批文化、新闻界人士撤退到香港，所以必须尽快出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和一些文化、文艺刊物。

香港是我旧游之地，九九寒天，这里还是繁花似锦。许多老朋友（金仲华、胡仲持、乔冠华、张明养等）对我说，你紧张了几年，也该松散一下了。可是我这个人好象命中注定了没有清闲的福气。我到香港后不久，范长江同志跟着来了。他告诉我，韬奋先生已经到了桂林，正由李任潮（济深）先生给他安排来港的机票，因为他是“参政员”，又是秘密离开重庆的，所以很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这样一来，办报的筹备工作就得提前开始了。据我记忆，韬奋是2月10日或12日平安到达香港的。他是一位十分讲究工作效率的人，同时对于蒋介石查封了各地的生活书店这件事非常愤慨，所以，在廖承志同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他说，当然最好是办报，但是为了尽快给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击，他已经决定先把《大众生活》复刊。因为生活书店在香港有分店，还有几位追随他多年的战友，所以办周刊可能比较容易。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在香港办报或出期刊，都得先向香港英政府注册，而向英国当局申请注册，一定要有一个在香港有声望的“法人”出面，同时还要先付港币两千元的“按金”。对此，廖承志说，申请办报的“法人”已经商定了，这个人是他的表兄、香港华比银行华人买办邓文田，具体事务则由邓的弟弟邓文钊负责，可以说

注册问题已经解决。而《大众生活》周刊的复刊，则遇到了先得找一位出面申请注册的“法人”的问题。

第二天，廖承志同志约了邹韬奋等七、八个人开会，讨论办报的具体工作。参加的人是：邹韬奋、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杨潮）、张明养、胡仲持和我。开会的地点是邓文钊安排的，在哪一条街，我已经记忆不起了。第一个讨论的问题，是这张报纸的名称。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既是一个远东唯一的自由港，在当时，又是英美法荷的、德意日的、蒋记国民党的和汪记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中心。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主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当时，在香港办报办刊物，也和蒋管区一样，稿件在发排前是要审查的。因此，为了尽可能让报纸能够公开发行，能够邮寄到南洋各地，廖承志同志想出了《华商报》这么一个报名，理由之一是申请注册的“法人”邓文田是商人；其次是用这个名称，工商界和一般市民看了也不会感到害怕。至于办报方针，则是大家一致的，就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是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批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这样的会连续开了几次。到3月下旬，我们接到了中央的一个指示，即《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于是对办报方针又作了一次认真的讨论。因为皖南事变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所以我们也相应地考虑了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问题。在香港办报，不注意“有理、有利、有节”这个方针是不行的。我们经常讲，后来还把自己办的印刷厂定名为“有利印务公司”，但也常常因为时局的变化，而忘记了这个“节”字。最近我翻看了一些当时的旧报，

我自己写的文章中，也不止一次掌握不好“有节”这个分寸。

大概在3月底，桂林《救亡日报》同人由林林、张尔华（敏思）同志带队，平安地到达香港。我们又开了一系列的会，总结经验，妥善地安排了善后工作。一部分同志参加了《华商报》，一部分人回乡隐蔽，张敏思、林林则和杜埃一起到菲律宾去参加侨报工作。从3月到5月，大批文化、文艺工作者从重庆、桂林撤退到香港，知名人士有茅盾、胡绳、张友渔、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章泯、萧红、胡考等，同时于伶等人也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大批文化人的撤离蒋管区，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华商报》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当时，组成了一个社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编委会，每星期开会一次，讨论的主要是时局问题。据我记忆，对版面之类的问题议论得很少，经理部则由邓文钊负责，黎芳任经理，张惠通任营业主任。经济方面的事我们这些人就根本不管。反正是“书生办报”，颇有一点“八仙过海”的味道。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写几篇社论或时事述评之类的文章，并主持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这样，和办《救亡日报》比较起来，我肩上的责任就轻得多了。

在《华商报》，韬奋也写过不少文章，开社委会的时候，他也积极参加。但是他的工作重点还在《大众生活》。为了要找一位“港绅”或者所谓“太平绅士”来作这份周刊的“督印人”，他花了不少气力。可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一位“港绅”，居然于无意中得之。关于这件事，茅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的香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特务——蒋记的、汪记的

等等，他们要破坏韬奋的活动，自不待言。香港政府自然也不会欢迎韬奋这样一个人来办刊物，不过，既然标榜着‘言论自由’，就不好公然不许，而只能在刊物登记的条件上做文章。照那条例，刊物的负责者是发行人，而发行人则须是‘港绅’，韬奋当然不能自任发行人去申请登记，而必须另找一位港绅来‘合作’，……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罢，韬奋终于找到一位发行人了。原来有一位曹先生（他的父亲是所谓‘港绅’），早已登记好了要办一个周刊。但因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主编，故而那刊物还没问世。这位曹先生年纪还轻，读过韬奋的著作及其所编的刊物，可以说是对韬奋的道德文章有相当认识、对于韬奋怀着敬佩之心的人。经过第三者的介绍，事情就成功了。”

这位曹先生叫曹克安，登记的周刊仍叫《大众生活》。应韬奋之约，我参加了编委会，除韬奋任主编外，编委有千家驹、茅盾、金仲华、乔木（乔冠华）、胡绳、夏衍等共七人。《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一是《华商报》初创，而韬奋和《大众生活》在香港和东南亚早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早在1935年，韬奋和胡愈之等就在香港办过《生活》半月刊；其次是《华商报》除了在政治上廖承志等同志经常有原则性的指示外，说得好一点是集体领导，事实上是编委们“各显神通”。而《大众生活》则有韬奋这样一位“主编”，而这位主编又的确抓得很紧。这个刊物雷打不动地每周开一次编委会，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韬奋的特点是用他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份刊物。他不止一次

说过，他办刊物的经验是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答读者来信（就是“信箱”和“简复”）。社论绝大部分是经过编委讨论题目后由他亲自执笔的。而他花精力最多的，则是答读者来信。有一次私下谈话，他对我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

《大众生活》是1941年5月17日在香港复刊的，比《华商报》晚了四十天。由于韬奋抓得紧，每次编委会上都“派”任务，分派给我写的主要是“周末笔谈”和散文、随笔，用的是夏衍和另一个笔名任晦。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时期我在《大众生活》写的文章可能不比在《华商报》上写的少。这一年秋，当《大众生活》登完了茅盾的《腐蚀》之后，因为编委中除茅盾外只有我一个是搞文艺的，于是韬奋就硬要我写一篇连载小说。在我的感觉中，总觉得韬奋要我做的事，是难以推拒的。

“打鸭子上架”，于是我写了一生中唯一的中篇小说《春寒》，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作品。

到1941年6月，也就是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夕，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一个宣传基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除了《华商报》和《大众生活》之外，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都相继出版。由于丁聪、叶浅予、特伟、胡考都到了香港，所以辛辣的漫画不仅经常在进步报刊上发表，而且还打进了《星岛日报》之类的中间偏右的报纸。

《华商报》和《大众生活》先后出版，正值盟军在巴尔干

战败，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前夕。同时，在远东战场，日本准备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力图制造汪蒋合作，全力谋求结束“中国事变”。因此一报一刊的编委会，势所必然地成了讨论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场所。当时在香港有一张“汪记”日报，不断地向重庆伸出诱降的触角，为此在5月底，韬奋和范长江、金仲华、沈志远、于毅夫、韩幽桐、沈兹九等，联名发表宣言：《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严正指出只有团结、进步、民主，才能坚持抗战，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在我记忆中，1941年可以说是国际形势变化最剧烈的一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诗，用在这个时候是最适当了。6月下旬，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到9月底，德军进逼莫斯科郊区，苏联党政机关东撤。于是，莫斯科会不会失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会不会蹈1812年的拿破仑的覆辙？就成了《华商报》编委会议论的中心。这个编委会中有不少国际问题专家，我记得有几次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深夜，乔冠华和羊枣争论得面红耳赤，其实争论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矛盾，一个说莫斯科一定能守住，另一个则说希特勒即使侵占了莫斯科，冬天即将到来，他一定也会被“严寒”这个强敌所挫败。在那个时期，我不仅给《华商报》、《大众生活》写文章，也还在《笔谈》、《文艺阵地》上撰稿。

希特勒的“闪电战”失败，苏德战争出现了胶着状态之后，日美关系就成了大家关注的中心。10月底，东条英机在“翼赞会”发表演讲，说“日美谈判假如不能得到妥协，那么日本就要实践三国同盟的义务”，而日本要求美国妥协的条件，又有一条是迫使美国同意日本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内容实质是蒋汪合流，成立中日联合反共政府）。这样，罗斯福会不会

对日妥协？日军会不会南下？也成了《华商报》编委会上和我们日常谈话的焦点。当时我和乔冠华同住在九龙弥敦道山林道“雄鸡饭店”楼上，为了日美谈判问题，杨刚、胡绳、于伶等同志常常到我们住处来议论。我记得很清楚，12月1日那天晚上，乔冠华为《大众生活》写了一篇《谈日美谈判》的评论，其中谈到：“日本纵使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美日谈判也不会因此寿终正寝，日本更不会马上就发动战争。”对这一意见，我们之间有过争论，只是由于当时罗斯福的态度比较坚决，日本海陆军之间也还有矛盾，所以我们也认为日本还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篇文章发表在12月6日的《大众生活》新三十号上，可是就在发表后的第三天，8日清晨，我还没有起床，忽然有人猛烈地敲门，我起身开门，进来的爱泼斯坦大声地说：“War”（战争）！原来日本不仅偷袭了珍珠港，而且战火已经波及到了香港。

我们匆忙地赶到香港。当天上午，廖承志就召集了紧急会议，工委和文化、新闻界的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讨论的已经不是日本会不会南进的问题，而是香港能不能守住，和在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如何应变的问题了。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港英当局可能会抵抗一阵，但是要在这个小岛上长期作战，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讨论的重点就集中在如何疏散的问题。廖承志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派人和东江纵队联系，要曾生同志尽快派一支别动队到九龙来协助疏散工作，因为从九龙翻过一座山，就是东江纵队的游击基地。日本飞机已经在九龙投弹，香港可以听到枪炮声，看来港英当局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也没有认真的准备，所以当天就决定《华商报》和《大众生活》暂时“休刊”。这样，《华商报》于12月10日停刊，《大众生活》

则在12月6日的新三十号之后就不再出版,连韬奋同志写的“暂别读者”也未能发表。我从这天早晨离开九龙之后,就一直留在香港。不久,渡轮就停止了。又是一次“倾家荡产”,我在香港置备起来的衣物、书籍,连替换的衣服,也完全丢了。

在炮火声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约是12月12或13日,一位澳大利亚籍的英国记者贝特兰(他在1937年10月,曾在延安访问过毛主席。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向廖承志同志提出,说香港当局想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会晤,讨论协同保卫港九的问题。这样,下一天,廖承志、乔冠华和我,和香港总督杨慕琦的代表辅政司(忘其名)以及居间人贝特兰在香港大酒店三楼举行了会谈。我方表示,我东江纵队可以协同驻港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保卫港九,但是英方得供应必要的武器弹药(当时提的不过是轻武器),这位辅政司似乎很诚恳地表示立即向港督报告,尽可能满足我方要求,可是从此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事情是很清楚的,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知道,港九这块弹丸之地是保不住的,让日本占了,英美联军打败日本之后,日本还得把香港交还给英国。而一旦中共部队进入港九,那么战争结束之后,问题就复杂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阶级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18日(?)下午,在日机猛烈轰炸之后不久,廖承志同志在哥罗斯它大酒店楼下大厅,分批分组地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这时,东江纵队的先遣队已经到达九龙,因此这一天就把撤退方案和途径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决定了撤退时的小分队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以及港九沦陷后的应注意事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离时必需的经费。幸亏布置得及时,考虑得周到,同时也亏得东江纵队的一个抢救文化人的

突击队及时赶到，和工委取得了联系，所以在1941年12月25日，正好是“圣诞节”这一天，港督手持白旗向日军投降之后不久，所有和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除诗人林庚白中流弹牺牲外），都陆续安全地撤离了香港。绝大部分人——廖承志、柳亚子、韬奋、茅盾、胡绳、于伶……都是先到东江游击区，然后再经韶关分批回到桂林和重庆；韬奋和范长江则先后经江西、浙江、上海，转到新四军根据地；我和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金仲华、郁风、谢和赓、王莹……等，则是坐小艇经澳门、台山、柳州回到了桂林。对这一段往事，我在1942年写过一篇《走险记》，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以上所记是前期《华商报》的概况。当时是一张对开晚报，时间也只出版了八个月。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之后不久，1945年9月，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派徐迈进和我回上海，分别筹备复刊《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种种阻挠，《新华日报》的复刊一直未能实现，《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于10月10日复刊，只出版了十五天，也就遭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查禁。于是，党中央、南方局就决定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林默涵、廖沫沙、邵荃麟等同志到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同志，重新建立新的宣传据点。《华商报》于10月间开始筹备，1946年1月4日改为日报复刊，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当时我在上海，没有参与筹备工作，对《华商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1946年4、5月间，在“法币”猛跌之际，恩来同志要我把一笔现款通过我熟悉的通易信托银行（黄定慧女士）尽快汇寄给章汉夫同志。同

年7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9月间，周恩来同志临时决定，要我去新加坡了解在战争中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并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我于10月间从上海飞到香港，为了办去新加坡的“入境证”，在香港耽误了四个多月。这时，在香港除了《华商报》之外，还办了一张小型的《正报》（它的前身是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由方方同志直接负责。章汉夫、胡绳同志负责的《群众》，乔冠华、龚澎同志负责的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国》，都已陆续出版。同时，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据我记忆，这时期的《华商报》比五年前更正规化了，除高天、赵元浩、黄新波、吕剑、华嘉、杨奇、司徒坚……等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外，还有一个阵容很整齐的社论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乔冠华、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生等。我路经香港时，也参加了社论委员会，并在华嘉主编的副刊上写一些杂文随笔。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战后的政治情况也十分复杂，“惨胜”之后，中国成了“五强”之一，内战也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华商报》复刊初期，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港英当局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因此从这以后，报刊上就没有开“天窗”的事了。）但是，《华商报》是“中共喉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因此在香港这个地方，它的销数一直是徘徊在一万份左右，经济上有不少困难。当我在1947年3月14日动身去新加坡的前夕，章汉夫、饶彰风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在南洋展开一个“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筹款”运动。我在3月20日（我军撤出延安

的下一天)抵星洲,到同年8月下旬被“礼送出境”这半年多的时间内,通过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集了三万多元(叻币)经费。由于抗战时期国内有不少社团到南洋向侨领们募捐,有少数人没有把捐款用途向陈嘉庚先生报告,侨领们很有意见,所以我离开香港时和章汉夫同志商定,这次筹款一定要通过群众路线,并且把筹得的经费数目逐日在《南侨日报》和《华商报》上公布。筹款不向侨领们伸手,靠的是集腋成裘,因此,这笔在半年内筹集的三万几千块钱,都是一元、五毛乃至三分、五分的小数目累积起来的。有时我和陆浮到《南侨日报》经理部去接受捐款,当我收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侨胞——有橡胶工人、司机、小学教员以至清洁工人联合“捐献”的五元、十元捐款,和读到他们写的“向香港文化界致敬”之类的函件的时候,真的会禁不住掉下眼泪。去年冬,我收到过暨南大学新闻系给我的来信,要我写一点在华南和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文章。我倒觉得不论搞新闻史也好,写华侨史也好,这种处于华侨底层的劳动群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节衣缩食地为革命事业献出几个“斗零”的义举,是永远不该忘记的。直到今天,事隔三十多年,我还能回忆得起,当时他们交出捐款信件,又急于想从我们口中知道一点国内解放战争情况的面影。这些侨胞实在太可爱、太可敬了!

我参加后期《华商报》,是从1947年9月到1949年4月底这一段时间。当时,党要我做的是统战工作,只是捎带着给《华商报》和《群众》写一点文章。近年来有人写回忆文章,说这段时期我分管文艺工作,并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这样说,按实际情况是不完全准确的。当时分管文艺工作的是邵荃